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钦定廓尔喀纪略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钦定廓尔喀纪略

(清) 方略馆 编 季垣垣 点校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 轺

点 校：季垣垣

封面设计：李建雄

技术编辑：姜 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钦定廓尔喀纪略/(清)方略馆编;季垣垣点校.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ISBN 7-80057-702-3

I. 钦... II. ①方...②季... III. 清代战争-史料 IV. E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541 号

钦定廓尔喀纪略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6.5

字数 508 千

印数 2000 册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书号 ISBN 7-80057-702-3/K·127

定价：39.50 元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

钦定巴勒布纪略

钦定廓尔喀纪略

西藏奏疏

西藏纪游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理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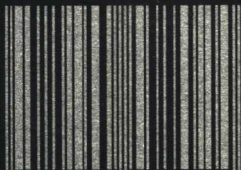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

钦定理藩部则例

有泰日记



ISBN 7-80057- 702-3



9 787800 577024 >

ISBN 7-80057-702-3/K · 127 定价：39.50 元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拉巴平措

顾 问 朱晓明 邓锐龄

副主编 马丽华 季垣垣（执行）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

王维强	冯 良	毕 华	李建雄
陈庆英	陈燮章	赵云田	格 勒
索文清	索朗多吉	黄维忠	廉湘民

总 序

拉巴平措

涉及西藏历史的汉文古籍文献史料的大规模搜集和系统的整理，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国现代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刚刚起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藏学研究基础史料的建设。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得以进行和深入的基础，但当时这个基础还很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科研工作的迫切需要。虽然有关西藏的藏汉文书籍、史料非常丰富，但一直未能得以系统的整理和出版。尤其经过十年动乱后，藏、汉文史料皆遭劫难，难以数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稿本正在不断散失，情况不容乐观；幸存的一些古籍由于久未重版，业已老化，无法提供使用；有些著作仅有手抄本或稿本存世，濒于失传；有关藏事的文献、档案更是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图书档案部门，查找相当不便。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为此，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都从筹建伊始，就着手进行西藏学汉文文献古籍的抢救、挖掘工作，多年来，

依靠内地在资料、人才、工艺等方面的优势，广泛收集各类藏事文献。为尽快提供使用，在查找、搜集及确定善本、孤本、抄本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摘编、辑录、影印、重版、精楷手抄、缩微影印等方法，整理出版了《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三套有关藏事的文献古籍丛书，计178种446册，分别以线装、精装和平装印行，总字数五千余万字。如此大规模地整理藏学汉文古籍文献，诚为前所未有的，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欢迎和好评。

这些汉文文献古籍的问世，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它们以无可辩驳的历史真实记载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文献古籍丛书的出版，还适应了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工作的藏学界的急需，成为当时许多研究人员的案头必备，不仅为中国藏学的发展出了力，也保存了某些汉文古籍的本来面目和版本特色，使西藏学汉文文献的某些善本、孤本和手稿早日得以流传。但这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搜集整理工作毕竟带有抢救性质，加上经费有限等各种因素，已出版的各种文本难免有草创痕迹，尚有不少不尽如人意处，如丛书出版以线装本和影印本为主，书价较高，私人购置不易；古籍的文字虽概括、简练，但与现代用语是有距离的，且全部是繁体字，绝大部分又没有句读，这对从事藏事工作者中占多数的中青年成员来说，使用起来不无障碍；有些稿本、抄本为保持原貌，

并未进行校勘和应有的注释；重抄、重版书及大部头书中的藏事摘编和辑录，因抢时间和急就章式的编辑，漏编、差误与疏忽也在所难免；即使是精装本和平装本，也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印刷、装帧等都很粗糙简单，版式也不规范。总之，不足与遗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藏学研究已经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藏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藏学研究的成果绚丽多彩，其中在藏学基础史料的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明显，各地区、各部门陆续成编的藏汉文文献史料专辑和汇编正在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在藏学研究日益出现新局面的现在，汉文史料中的古籍整理也应该上一个新的台阶。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将曾经编辑影印过的汉文古籍文献择其精要加以整理，重排、重校，增加注释，统一体例规范，编辑出版全标点校注本《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将其作为藏研中心的重点课题，并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有关西藏的文献史料数量浩繁，内容庞杂，涉及的领域广泛，根据现有的力量和条件，按照西藏三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和学术科研的要求，我们把重点放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国藏学事业发展的基础史料的整理。《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主要辑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典章类，如清代官修重要法典《钦定理藩部则例》，它是清代的民族法，从法律上规定了各民族的地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映了清朝办

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是祖国统一的重要史证之一，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记述祖国统一的重要文献。二是军机方略类。方略是史料中极为详备、极具价值的一种，因其篇幅巨大、资料丰富，历来倍受史学家的重视。如《钦定巴勒布纪略》、《钦定廓尔喀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都是有关藏事的重要史籍，且都是官修史料，虽然有其局限性及修撰时人为的弊端，但因是当时发生事件始末最完整的记录，对时间、地点、人名以及各方政治往来、军事冲突等都有确切详尽的记载，庶可弥补藏文史料某些缺憾，并可与现在大量问世的各种藏文典籍相比较、考证、参订，还原真实的历史。三是入藏官员的奏稿、文牒、日记等，如《抚远大将军允禔奏稿》、《西藏奏疏》、《有泰日记》等。它们的作者是当时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所记载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因其真实可靠，一向被研究人员视为不可或缺的参考。这些颇具个人色彩的撰文，视角和选材自有特色，可与正史两相参照，取长补短，对了解历史真相大有帮助。四是古籍文献的专题汇编、摘编、辑录及重要的西藏方志书籍重加整理或再版，为藏学研究人员和藏事工作者提供了尽可能全面的参考资料。这部丛刊所收录的古籍文献，展现的不仅仅是单个的历史事件，而且是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缩影。这些文献史料往往一文多事，除记录历史事件外，还涉及旧西藏的政治人文、疆域地理、宗教民俗、地丁钱粮、徭役差赋等多方面的内容，既可供多学科研究使用，也可为现代西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提供历史的镜鉴。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为简体字标点校注本，必将使读者面更为广泛，阅读和使用起来也会更加方便。二十多年前，我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任职时即已参与了这项工作的起步，看到它将以现代科技包装过的崭新面目重新问世，深感欣慰，并由此深切怀念为这项工作呕心沥血、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这项事业的陈家璉先生。这套丛书从搜集、整理到出版的过程，记录和折射出了二十多年前我国藏学研究起步时的紧迫与艰辛，反映了藏学基础史料建设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搜集整理汉文文献古籍工作进行下去，为藏学研究事业铺路筑基，开拓中国藏学更加繁荣的未来。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即将付梓，兹略述缘起，是为序。

2005 年元月

前 言

《钦定廓尔喀纪略》为清方略馆编纂，是继《钦定巴勒布纪略》一书之后，又一部记述廓尔喀侵藏战争的官书。其书汇集了乾隆五十六年八月至乾隆五十八年十月的奏章上谕，记述了廓尔喀二次入侵后藏及清政府派兵击退入侵者的全过程，和处理藏政的善后事宜。是书资料详备，记述精确，史料价值极高，与《钦定巴勒布纪略》一书叙事相连，堪称古代最详尽的反侵略战争的姐妹篇史籍。

所谓“廓尔喀”、“巴勒布”都指尼泊尔而言。

尼泊尔一词来自尼泊尔谷地（即加德满都谷地）的名称。

公元前六世纪，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山谷已有不少居民定居在此，最早定居此地的是尼瓦人，清代官方记载则称之为巴勒布人。在廓尔喀兴起之前，加德满都山谷的统治者是尼瓦族王。尼瓦人组织能力很强，建立了良好的农业制度，对尼泊尔早期的艺术与建筑也有过极大的贡献。加德满都是当时北印度的艺

术、宗教与文化中心。公元六二〇年左右，尼泊尔土酋阿姆苏瓦曼统一了尼泊尔，自立为王。公元六三九年，阿姆苏瓦曼将女儿赤尊公主嫁到吐蕃，也将早在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就传入尼泊尔的佛教文化带到了西藏。十五世纪初，统治尼泊尔的马拉王朝解体，逐渐形成许多土邦王国。

十三世纪时，环绕着加德满都谷地的部落有二十四部之多，这些部落几乎全都为一些自称属于高级印度种姓的印度移民所统治。移民是在穆斯林势力进入印度后避居到尼泊尔山地的，廓尔喀就是由印度拉加普族所建立的王国。十八世纪以前，廓尔喀只是尼泊尔二十四部落之一，位于加德满都西北约六日程的地方。十八世纪，廓尔喀鲸吞巴勒布三部，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迁都加德满都，建立了新的王朝。之前，与清廷关系较密切的是巴勒布三部。清雍正年间，巴勒布之雅木布、叶楞、库库木三部即已遣使请安，进贡方物，与清廷建立了联系。也因此，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时，驻藏大臣只知有巴勒布，不知有廓尔喀，所以凡奏章皆称巴勒布。乾隆五十六年（1771）清廷始改称廓尔喀，第二部有关方略则被称为《钦定廓尔喀纪略》。

《钦定廓尔喀纪略》详尽记述了平定廓尔喀之战的始末及廓尔喀第二次入寇西藏的缘由。廓尔喀在三年时间内两次侵藏，主要是基于其商业利益和领土扩张的需要。

廓尔喀位于我国西南，接壤的边境线长达一千一

百余公里，山口通道众多，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廓尔喀又地当印藏往来孔道，络绎于途的既有经商者也有僧侣。西藏经常有僧人前往印度学经，途中多停留加德满都学习印度语文；西藏商人畏惧印度的炎热，也多由廓尔喀人从中转输商品，廓尔喀成为藏印通商往来的桥梁。西藏虽久隶中国版图，但究竟相距中原内地有数千里之遥，彼此之间的商务联系自不如与廓尔喀近便，所以乾隆年间就有上千巴勒布人（当时对尼泊尔人的通称）在西藏打工做生意。据廓尔喀大头目噶登麻撒海稟称，“巴勒布远在边外，与唐古忒人众和好，彼此互相贸易，历有岁年……我巴勒布现有千百人在西藏佣工贸易，藏内之人亦有在我境内贩运粮食、布匹者”，可见当时两地商务关系之紧密。十八世纪以来，廓尔喀吞并诸部、蚕食邻封，势力正盛，又因其国小民众，人口几与西藏相埒，疆域却只有西藏的 $1/9$ ，国内之民难于自给，必然向外发展。王子拉特纳巴都尔即位后，其统治集团恃强剽掠之心不减，更积极向外扩张。当其势力受阻于锡金和英人后，好战的廓尔喀人遂将注意力转向西藏，觊觎西藏广阔的疆土和丰厚的经济收益。

两次廓尔喀入侵之战的起因都和彼此的商务贸易、银钱交易有关。历史上西藏没有自己的铸币机构，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西藏的货币都靠廓尔喀供给。廓尔喀为西藏铸币，西藏则用大量的银子去换回同等数量的银钱。银钱铸造时掺铜的多少决定银

钱成色的高低，廓尔喀欲将新铸成色高的银钱一圆抵旧钱两圆使用。这种明显的不平等交易，自然遭到达赖喇嘛和众噶伦的坚决抵制，拒绝行用。于是引发了第一次廓尔喀之战。廓尔喀藉口食盐掺土、妄增税款等缘由越过边境，侵占了距加德满都很近的后藏聂拉木、济咙等地。清廷接到驻藏大臣奏报后，即派鄂辉、成德前往查办，又派熟悉藏情的理藩院侍郎巴忠以御前侍卫钦差大臣名义赴藏会办。巴忠入藏后，为求速行完结此事而迁就和局，将就了事，以廓尔喀向清廷上表朝贡为交换条件，擅自允许西藏与廓尔喀私下解决纷争，许银赎地。随后，巴忠以廓尔喀退地请降饰奏。廓尔喀第一次侵藏之战虽暂告结束，但每年付给廓尔喀三百个银元宝（合九千六百两纹银）非藏中所情愿，所以第二年西藏就拖延不付。曾在第一次战争调停说和的六世班禅之兄弟沙玛尔巴，因觊觎扎什伦布资财，挑拨唆使廓尔喀到后藏抢掠，很快导致了廓尔喀的第二次入寇。

廓尔喀藉口债务不清，于乾隆五十六年八月诱劫达赖喇嘛派往边境的噶伦等官员，侵占聂拉木，遂分路再犯藏界，占领济咙，围攻宗喀，滋扰定结，抢占定日，并直抵后藏，将扎什伦布寺庙财物抢掠一空，猖狂之极。这次侵掠，严重威胁到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使清廷大为震惊。为永杜边患，维护西藏这块圣土之安全，清政府决心对廓尔喀大加挾伐，收复失地。于是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统率劲旅，“大举深入，歼其丑类，使之震

慑军威，不敢再萌窥伺，方为一劳永逸之计”。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指出入藏征讨廓尔喀侵略军势在必行的原因：“此事初起之时……并非必欲大办”，但廓尔喀“竟敢扰至扎什伦布，肆行抢掠，若不痛加歼戮，使其无所忌惮，势必为得尺则尺之计，渐至侵及前藏，即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带，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渐成边患。且此时仅以和息了事，将来大兵撤后，倘贼匪复来滋事，后藏距川省辽远，鞭长莫及，断无屡劳兵力远涉剿办之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前往，声罪致讨，无非为绥靖边隅，保护卫藏起见”。这次战事声势浩大，除西藏原有的绿营兵、藏兵、达木蒙古兵以外，调集了索伦达呼尔兵、屯练兵及德格特、三杂谷、绰斯甲布部土兵等骁勇善战之各族兵勇，分别由青海、四川两路进藏；派四川总督孙士毅坐镇察木多、打箭炉，专事调派兵丁，筹运粮饷，设置台站等；又动员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各省力量沿途接待，备办车辆马匹廩给诸事；除部拨专项银两外，又协调陕西、山西、甘肃等省银两，以济军需。此次战争共派调各路官兵约万余人，沿途运送粮饷、文报递送、台站供应、驮运乌拉人夫、催趲管理兵丁等后路人员更是参战官兵的数倍。先后由川省赶运出口粮石及西藏采办糈粳等共七万四千五百余石，备办食用牛羊数万头只，总计用去库银六百余万两，历时约十个月，大小十数次战役，几乎全歼敌人，收回失地，并乘胜长驱深入廓尔喀境内追击其残部，终于迫使廓尔喀缴回所掠财物，

投降纳贡。

此次廓尔喀之战取得全面胜利，击退了侵略者，恢复了西藏地区的社会安定，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巩固了西南边防。但战争的深远意义并不仅限于军事方面，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的清政府大刀阔斧整顿藏政的一系列治藏安边措施的出台。

清代对西藏的政治统治是逐渐加强的。由康熙年间初派侍郎赫寿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至雍正及乾隆初期常川设置驻藏大臣二人总理藏务，其时驻藏大臣的主要职责除重大问题外只是监督藏政。乾隆十五年，清廷乘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机废除藏王，“仿众建以分其势”，置四噶伦分管政事，并增设内地驻防兵一千五百名，提高驻藏大臣职权，驻藏大臣开始与达赖喇嘛共理藏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行政的管理。但直至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时，驻藏大臣实际上仍自居于监督地位，诸事俱不过问。章程规定噶伦、戴琿等缺由驻藏大臣奏补，但实系由达赖喇嘛酌定补放，交驻藏办事大臣具奏；其余大小官员亦均由噶伦等酌拟数人，然后由达赖喇嘛挑定。达赖喇嘛亲属族人管理事务，倚仗权势，妄为滋事。官员出缺，常径由世家子弟补放，杂乱参差，不成体制等等，各种积弊不胜枚举。当时“派往驻藏办事之员多系中材谨飭，伊等前往居住只图班满回京，于藏中诸事并不与闻”，一切委之达赖喇嘛转付噶伦。众噶伦遂假借达赖喇嘛声势为所欲为，营私舞弊，诸事擅专，以致藏务日就废弛。乾隆皇帝慨叹：

“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间两次廓尔喀之战，各路官员络绎入藏办事，中央治藏和藏政本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乾隆皇帝决心改革藏政管理，数次谕令福康安等“此系极好机会……福康安等当趁此将藏中积习湔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福康安、和琳等与达赖喇嘛、众噶伦协商，针对西藏存在的具体问题先后筹酌具奏各种章程，如鄂辉等条奏收复巴勒布侵占藏地设站定界《筹办西藏善后事宜十九条》、《筹议番兵章程》、《藏内银钱鼓铸》、《应办理章程十八条》等，自乾隆五十七年七月起各种筹酌藏内善后章程往返具奏议定约一百余款，范围所及包括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宗教各方面，对西藏政教制度，无论形式或实质上都有重大的改革。最后议定并正式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即二十九条章程），对清朝治理西藏行之有效的各项规章制度都作了具体规定，并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公诸于世。章程规定西藏一切事务都由驻藏大臣统筹办理，同时对达赖、班禅转世采用金瓶掣签，以及官员任免、军队编制、钱币铸造、徭役差税、外贸边防等都作了制度上的规定。二十九条章程成为清代治藏基本法典，使清廷对西藏的治理日臻完善，加强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稳定了西藏的政局。廓尔喀之战以后，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驻藏大臣总揽西藏地方政权的历史阶段，这不仅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保持西藏地方的社